

“二元格局论”再审视：中美“印太”区域 经济影响力对比^①

蒋芳菲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二元格局论”的反思,尝试在“印太”视域下从经贸、投资、科技、金融四个维度系统评估了中美两国区域经济影响力对比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本文认为,中美在“印太”经济格局中各擅胜场,地区二元权力格局可能不是反映在经济与安全领域,而更多是反映在经济领域内部。目前中国在贸易领域影响力整体占优,但在个别维度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在投资和科技领域影响力与美国差距缩小,在部分维度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在金融领域影响力稳步提升,但仍与美国差距悬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有望在金融影响力上进一步收窄对美差距,但维持和扩大经贸影响力优势的难度或将加大,在投资和科技领域或与美国竞争更趋激烈,进一步缩小对美差距的阻力和不确定性或显著增加。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印太”地区 “二元格局论” 中美战略竞争 区域经济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并陆续成为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等周边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亚

①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肖河、肖立展、苏庆义、王碧珺、杨盼盼、石先进、陈逸豪、沈陈、王远航、许晓艺等师友在论文写作和数据搜集整理过程中对笔者的指点和帮助。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太地区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在区域经济秩序中获得主导地位;也有不少研究指出亚太/东亚地区已形成中美共同主导、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权力格局”,域内大多数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①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一面不断强化“印太战略”的“多领域一体化布局”,加紧拼凑“遏华战略包围圈”;一面高调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速推进“小院高墙”战略,诱迫周边国家对华经济技术“脱钩”。^② 在美国的拉拢和施压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都显著加强了与其经济、安全合作,并在其对外政策中表现出更强的对华“威胁认知”。^③ 东盟、日本、韩国等地区主要经济体还相继出台各自的“印太战略”,既对美国及其盟伴释放了积极合作信号,也对华表达了一定的“战略焦虑”。^④ 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疑惑为何中国难以将其地缘经济优势有效转换为足以抗衡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⑤也有学者更加怀

-
- ① 代表性文献参见 Evan A. Feigenbaum and Robert A. Manning, “A Tale of Two Asia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31, 2012, available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2/10/31/a-tale-of-two-asias/>, 2023.5.12; 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1, No. 1 (2016), pp.9~43; Zhao Quansheng, “An Emerging U.S.-China Dual Leadership in Asia-Pacific,” *China-US Focus*, May 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merging-us-china-dual-leadership-in-asia-pacific>, 2023.5.12;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54~91页。
-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March 28, 2022, available at: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2023.5.12; Brock R. Williams, Mark E. Manyin and Rachel F. Fefer, “Biden Administration Plans for a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ebruary 25, 2022, available at: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814>, 2023.5.12; 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29~46页。
- ③ 许少民:《国家利益、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重置》,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52~86页;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4期,第28~66页;邢瑞利:《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1~20页。
- ④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ASEA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June 2019, available at: https://asean.org/asean2020/wp-content/uploads/2021/01/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2023.5.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Effort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056243.pdf>, 2023.5.12;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trategy for a Free,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December 28,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ofa.go.kr/eng/brd/m_5676/view.do?seq=322133&page=1, 2023.5.12; 杨思灵:《印度的‘印太战略’:从战略模糊到结盟化》,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6期,第23~36页。
- ⑤ John Lee, “China’s Economic Leverage in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29, No. 1 (Spring/Summer 2015), pp.1~21.

疑所谓的“经济—安全二元权力格局”是否能够准确、客观概括地区真实现状。^①而这两方面的疑惑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更加基本且十分重要的问题: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印太”地区究竟是否真正享有经济影响力优势?

鉴于此,本文拟在“印太”视域下对中美两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估。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二元格局论”作为单极与两极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完善对比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的研究方法,科学研判对中国在地区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实力地位,有助于客观评估“二元格局论”及其流变,并为学界同仁进一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随着“印太”逐渐取代“亚太”成为美国对华开展全面经济竞争与地缘战略博弈的主要角力场,在“印太”视域下对中美两国区域经济影响力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明确中国在周边开展经济合作所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挑战,也可为中国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举措提供一定参考。

一 概念界定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尽管目前学界关于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对比的相关文献不在少数,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对“区域经济影响力”进行明确界定,甚至有不少研究将这一概念与“区域经贸影响力”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为明确研究对象和范围,本文将区域经济影响力界定为一国在某一特定区域经济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即该国影响区域内国际分工、制度安排,以及其他国家经济政策行为、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力。其一,本文对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的评估主要包括区域和国别两个层面。然而,鉴于中美两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往往也与其全球经济影响力,尤其是美国霸权地位息息相关,本文也会部分涉及全球层面。其二,本文主要聚焦于对“影响力大小”(即相对重要性)及其变化的评估,不涉及对“影响力性质”(正面或负面)的判断。其三,虽然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难以彻底剥离,但本文主要关注国家在经济领域获得的影响力,不涉及对中美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探讨。值得提及的是,对外经济援助、经济制裁等虽属于经济手段,但国家使用这些手段往往主要是为了获取/提升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本文也不涉及这两个维度的比较。

由于“印太”兼具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特性,目前不同国家和国内

^① Liu Feng, Liu Ruon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p.1~24.

外学界对“印太”地区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分歧。^① 一般而言,狭义的“印太”主要是指从东北亚、东南亚延伸至大洋洲和南亚,并涵盖太平洋岛屿的地区,但不包括欧洲和非洲东海岸;^②广义的“印太”主要是指从非洲(东海岸)经欧洲、南亚、东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太平洋岛国和美洲西岸,包括整个环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③ 本文将“印太”视为从“亚太”发展而来的地缘经济概念,并更侧重于长期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成员及中国周边国家。除中美两国,本文中“印太”地区的范围主要包括东北亚4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东南亚11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东帝汶)、南亚8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大洋洲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涵盖30个国家。

基于对区域经济影响力和地区涵盖范围的不同理解,国内外学界在研究路径和具体评估指标的选择上亦未达成共识。整体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包含单维、双维和多维三种代表性研究路径,并形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明显强于美国”、“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总体领先,但美国在部分领域/国家和地区占优”,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不敌美国”等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是以贸易为核心的单维研究路径。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陈小强博士等从贸易总额、贸易网络和中心度三个角度对中美在周边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目前占据区域贸易主导地位,但中美在地区贸易网络中处于相同级别的核心位

① 关于“印太”涵盖范围的讨论参见: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22页;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载《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第29~40页。

② 美国、加拿大对“印太”地区的范围界定相对较窄,参见 The White 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Strategy,”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3.5.12; Global Affairs Canada, “Canada’s Indo-Pacific Strategy,” November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assets/pdfs/indo-pacific-indo-pacifique/indo-pacific-indo-pacifique-en.pdf>, 2023.5.12。

③ 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欧盟等对“印太”地区的范围界定都相对较广,参见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Effort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056243.pdf>, 2023.5.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trategy for a Free,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December 28,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ofa.go.kr/eng/brd/m_5676/view.do?seq=322133&page=1, 2023.5.1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India’s Concept of Indo-Pacific is Inclusive and Across Oceans,” November 8,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gihamburg.gov.in/pdf/HIndio-Pacific-is-inclusive.pdf>, 2023.5.12;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oving Closer: European Views of the Indo-Pacific,” September 2021, available at: <https://ecfr.eu/special/moving-closer-european-views-of-the-indo-pacific/>, 2023.5.12。

置,中国“中介角色”更加突出,美国则具有更强的进口吸纳能力。^①中国科学院秦奇博士等通过计算 1995 年到 2015 年的贸易流,指出对东南亚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大的国家已从日本转移到美国,再转移到中国;中国已成为东盟绝大多数成员在经济上最依赖的国家。^②这一路径为系统对比中美经贸影响力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夸大了一国经贸影响力在其区域经济影响力中的决定作用,而相对忽略了投资、科技、金融等其他领域的重要性,因此仍过于片面。

二是以贸易和投资两个领域为基础的双维研究路径。例如,云南财经大学李艳芳副教授等从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评估了中美“印太”经济影响力,认为中国在贸易领域的优势逐步加大,但美国的投资影响力更大。^③外交学院聂文娟副教授则通过对比中美对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和投资额,指出中国已在东南亚地区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④这些研究虽在贸易领域的基础上引入了投资领域的对比,但过于聚焦于贸易/投资总额和依存度指标,对科技、金融等领域,以及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化程度等其他维度的指标都缺乏足够关注,因此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三是从多领域/视角切入的多维研究路径。例如,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乔纳森·斯特罗姆塞斯(Johnathan Stromseth)认为,美国在对外援助、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与东盟成员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中国近年来在贸易、旅游等多个领域的地区影响力已超过美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已与日本旗鼓相当。^⑤清华大学刘丰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刘若楠副教授两位学者通过对比中美在进出口总额、直接投资流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对外援助、国际分工等五个方面的表现,认为中、美、日三国共同占据着东亚贸易的主导地位,中国不仅在诸多领域不具备对美优势,甚至在对外援助等领域的影响力仍不及日本。^⑥英国渣打银行李伟骥博士等则从经济增速、消费和投资、外贸渠道、旅游渠道、外国直接投资等五个维度综合对比了中美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力,认为近年来中国对亚洲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美国经济增长对

① 陈小强等:《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商品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对比》,载《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第663~680页。

② 秦奇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东南亚地缘关系研究》,载《地理学报》,2018年第10期,第2014~2030页。

③ 李艳芳、支天越:《“印—大”地区经济发展与地缘经济格局演进》,载《亚太经济》,2019年第1期,第5~13页。

④ 聂文娟:《中美竞争态势下东南亚地区权力格局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2期,第21~47页。

⑤ Johnathan Stromseth, “Competing With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The Economic Imperativ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0/11/Jonathan-Stromseth.pdf>, 2023.5.12.

⑥ Liu Feng, Liu Ruon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p.1~24.

印、菲等国的影响更大。^① 另外,美国兰德公司林碧莹(Bonny Lin)等人的一项研究从经济依赖度、经济机会评估、经济威胁感知、经济合作意愿四个维度对比了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整体强于美国。^② 相较于前两种路径,这些研究尝试纳入了更多不同领域和维度的指标,因此更有利于全面、客观地展现中美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相对重要性。但既有研究中大部分评价指标仍属于经贸或投资领域,甚至部分指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交叉或重叠问题,因此在系统性、科学性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尝试初步构建关于比较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多维分析框架与多级评价指标体系,以尽力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本文认为,中美若要在“印太”地区获得区域经济影响力优势,至少需在贸易、投资、科技和金融四个主要维度付出长期努力。

其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际贸易一直是“印太”主要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鉴于“印太”经济体大多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域内外大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不仅直接关乎其国内经济增长,也是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内容,因此经贸影响力是评估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关键维度之一。

其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投资是国家获取海外资源与市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印太”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中美两国都显著增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且域内大多数经济体都是中美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伙伴。因此,投资影响力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两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差异与变化。

其三,在当今国际社会,科技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近年来,“印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孵化、产业化基地之一,也是美国全面开展对华科技竞争的“重镇”,因此科技影响力也是影响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和全球竞争态势的关键变量。

其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融是国家整合经济资源、维护市场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区域金融合作也一直是东亚/亚太区域

① 李伟斌、王蕊、马德威:《美国与中国:谁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力更大》,载《金融发展评论》,2013年第10期,第16~27页。

② Bonny Lin, Michael S. Chase, Jonah Blank, et al., “U.S. Versus Chinese Powers of Persuasion: Does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Have More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10137.html, 2023.5.12.

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也将金融影响力作为评判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的重要维度之一。

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该国在上述四个维度表现的综合结果。这也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消极变化都可能会对该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造成损害;一国提升区域经济影响力的难度可能要远远大于削弱其影响力的难度。同时,不同领域/维度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例如,一国在科技领域影响力的提升,往往能够对该国经贸影响力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经贸和投资也是国家间进行科技交流的重要途径,一国经贸和投资影响力的提升也会对该国科技实力的增长有一定助益。然而,由于不同维度所针对的领域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侧重点不同,因此这种相互促进作用仍是有限的。

通过将上述四个维度进一步细化,本文初步构建了对比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 中美“印太”经济影响力对比现状

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在贸易领域影响力整体占优,但个别维度仍不及美国;在投资和科技领域影响力与美国差距缩小,在部分维度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在金融领域影响力稳步提升,但仍与美国差距悬殊。

(一) 经贸:中国整体优势明显,但消费品进口仍不及美国^①

① 本文主要从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国海关总署、中国国家统计局相关报告提取中美与域内各国的贸易数据。但由于计价方式、转运贸易与原产地规则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统计口径数据仍存在一定差别。因此,为避免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数据问题,当各数据库均统计了同一数据时,本文主要以世贸组织、联合国等较具权威性的第三方数据库为准;当部分数据只能通过某一特定数据库提取时,本文则以该数据库为准。

表1 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①

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贸影响力	1) 中美与域内各国贸易总额
2) 域内各国对中美贸易依赖度 ^②		
3) 中美与域内各国贸易的品类结构 ^③		
4) 中美与域内经贸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覆盖范围		
投资影响力	1) 域内各国与中美的双向直接投资存量及对中美的投资依赖度 ^④	
	2) 中美对域内各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及增速	
	3) 中美对域内直接投资的收益—风险比 ^⑤	
	4) 中美与域内投资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覆盖范围	
科技影响力	1) 中美科技研发投入总额、强度及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2) 中美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及吸纳域内科技人才数量	
	3) 中美对域内各国科技产品出口总额	
	4) 中美与域内科技合作的覆盖范围、产出规模和效率	
金融影响力	1) 中美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 ^⑥	
	2) 中美在域内的货币影响力 ^⑦	
	3) 中美在域内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⑧	

- ① 本文暂不探讨不同维度影响力在一国区域经济影响力中的相对权重。关于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的指标构建,参考 Liu Feng, Liu Ruona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rder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An Economy-Security Nexus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p.1~24; Susannah Patton et al., 2023 *Key Findings Report*, Lowy Institute Asia Power Index, lowy-institute-2023-asia-power-index-key-findings-report.pdf, 2023.6.10; 董惠梅等:《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对华影响及政策建议:基于各成员国对中美贸易投资状况的对比分析》,载《全球化》,2023年第1期,第63~74页;全球金融竞争力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 ② 本文根据域内国家当年对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与当年贸易总额的百分比计算其对中美的贸易依赖度。
- ③ 本文根据域内国家对中美某类产品的进口额(或出口额)占该国对中美总进口额(或总出口额)的比重计算中美与域内各国贸易的品类结构。
- ④ 本文根据中美两国对域内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域内各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值计算域内各国对中美的投资依赖度。
- ⑤ 本文主要根据中美在“印太”地区的投资行业结构和投资目的国的风险评级来大致判断中美在“印太”地区直接投资的收益—风险比。有研究指出,投资收益—风险比越高,意味着投资潜力越大,投资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安全风险越小,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和国际影响力越大。参见 Jiang Fangfei, Wang Yuzhu,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Protection: From the Risk-Return Perspective,”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Vol. 4, Issue 1 (January 2021), pp.79~101。
- ⑥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美金融体系规模、效率、活力和稳定性等指标来对两国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参见全球金融竞争力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1》,第9~13页。
- ⑦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美在域内各国外汇储备、跨境支付等货币占比来比较中美在域内的货币影响力。
- ⑧ 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美在国际和区域金融治理机制平台中的份额、投票权重等对比两国在区域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其一,中国与“印太”国家贸易总额和占比领先美国。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统计,2021年中美与“印太”30国贸易总额分别达2.11万亿美元、9700亿美元。2018~2021年,中国与其中19国^①的进、出口额均高于美国。2012~2021年,文、澳等国对华出口总额分别高达对美出口总额的31倍和8.6倍;越南等国对华进口额是美进口额的6.1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美国人口普查局相关数据统计,2022年,中美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9753.4亿美元、4483.5亿美元,各占中美外贸总值的15.5%和6.4%;中美与日韩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7197.1亿美元、4154.6亿美元,各占中美外贸总值的8.7%和6%。

其二,域内各国对中国贸易依赖度整体高于美国,但部分国家对美国出口依赖度更高。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统计,2018~2021年,域内各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高于美国,其中韩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对华进口依赖度都超过了20%。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对华出口依赖度更高;泰国、日本等国对中美出口依赖度不相上下;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对美国出口依赖度更高。截至目前,东盟已连续三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前三大贸易伙伴都不在“印太”地区。在公布了相关数据的“印太”25国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4国^②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8国^③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仅为其中1国(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6国^④的第二大贸易伙伴。^⑤

其三,中国与域内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仍主要以中间品为主,美国则以消费品为主。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印太”地区25个主要国家对中美原材料、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进口依赖度分别为2.7%/8.9%、30.5%/8.1%、26.4%/9.5%;对中美出口依赖度分别为28.4%/3.1%、20%/13.9%、12.1%/27.6%。^⑥各国在原材料出口、消费品进口,以及中间品的进、出口等方面对中国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但在消费品出口、原材料进口等方面仍更依赖美国(如图1至图3所示)。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在区域供应链中主要承担中间品加工制造的角色,美国在区域供应链中仍处于

① 包括:东北亚4国、中亚5国、东南亚8国(缅、泰、老、新、文、菲、马来、印尼)、大洋洲2国。

② 包括:日本、韩国、蒙古国、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

③ 包括: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文莱。

④ 包括:日本、韩国、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⑤ 本文关于域内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序,均根据各国向联合国提交的最新年度数据计算得出。其中有5个国家未公布数据,因此本文仅统计了能够获取相关数据的25国。另外,此处按国别计算贸易伙伴,东盟不包括在内。

⑥ 能够获取数据的25国包括:东北亚3国(日、韩、蒙)、中亚4国(哈、乌、塔、吉)、东南亚10国(除东帝汶外)、南亚6国(印、巴、阿、尼、斯、马代)、大洋洲2国。本文将中美与域内各国贸易品类大致划分为原材料(代码3、21、111、121)、中间品(代码4、7、22、53、521)和消费品(代码6、51、112、122、522)三大品类。

相对高端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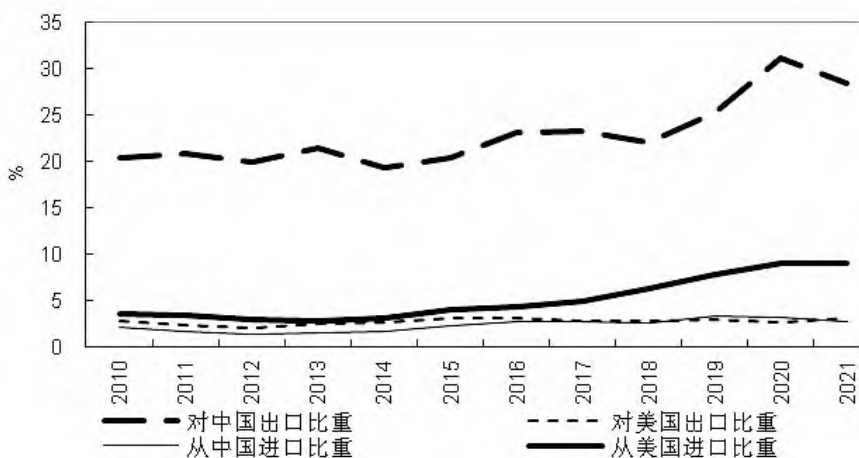


图1 “印太”25国对中美原材料进出口依赖度(2010~2021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s, WITS)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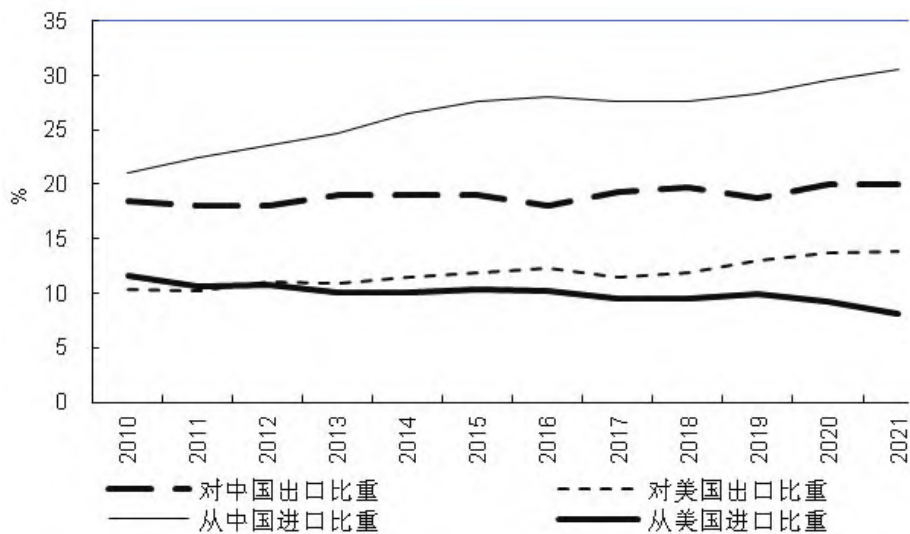


图2 “印太”25国对中美中间品进出口依赖度(2010~2021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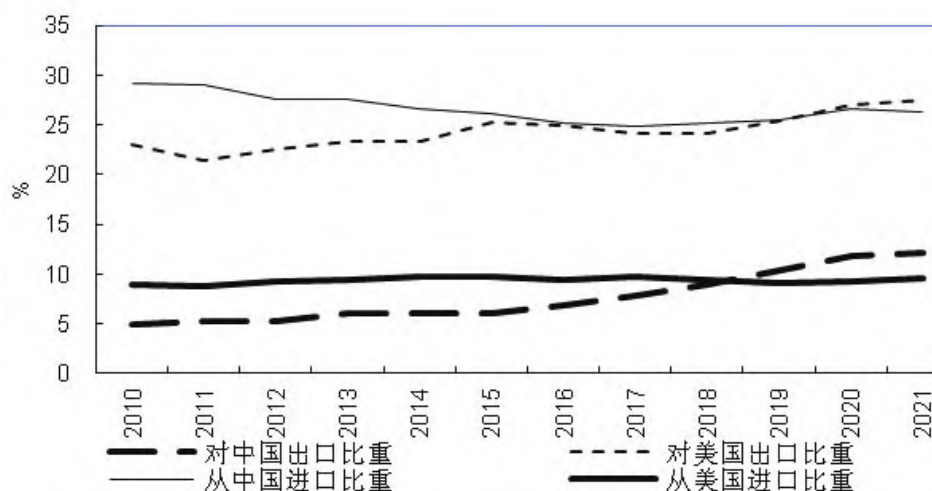


图3 “印太”25国对中美消费品进出口依赖度(2010~2021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其四,中国与域内国家经贸合作机制化程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且在域内主要双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平台中的参与度远高于美国。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域内贸易伙伴签署12个双边自贸协定(含升级)和1个多边自贸协定(如表2所示);与地区主要成员在“一带一路”“10+1”“10+3”等多个机制平台下长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且正积极推进加入CPTPP进程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相较而言,美国目前只与韩国、新加坡两国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自2017年退出TPP后尚未与域内国家签署任何多边自贸协定。

表2 中国与“印太”贸易伙伴签署自贸协定情况

中国与“印太”贸易伙伴已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		
中国-韩国	中国-东盟(含“10+1”升级)	中国-新加坡(含升级)
中国-柬埔寨	中国-新西兰(含升级)	中国-澳大利亚
中国-巴基斯坦(含第二阶段)	中国-马尔代夫	
中国与“印太”贸易伙伴已签署的多边自贸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相关数据整理自制而成,见 <http://fta.mofcom.gov.cn/>, 2023年3月23日。

(二)投资:美国整体领先,但中国在部分维度具有一定比较优势

其一,美国与“印太”国家的双向直接投资存量远高于中国,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对美国投资依赖度更高。根据中美两国公布的最新官方数据统计,截

至 2021 年底,中美对外投资存量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和第一。中国对“印太”29 国(除不丹以外)的投资存量为 2200.14 亿美元;美国仅对其中 10 国的投资存量便高达 7246.43 亿美元,尤其在日本、印度、韩国三国的投资规模为中国的 24.3 倍、12.9 倍和 5.8 倍。^①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 7 国对中美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 3545.1 亿美元和 8972.17 亿美元,且对美国的投资依赖度都远高于中国。^②

其二,中国对“印太”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整体不及美国,但对东盟的投资增速更快。据统计,202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为 1788.2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中国对“印太”28 国(除朝鲜、不丹以外)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261.2 亿美元,占当年总流量的 14.6%。^③ 2021 年,美国对外投资流量总额 4033 亿美元,其中对日、韩等“印太”10 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264.6 亿美元,占当年总流量的 6.6%。^④ 2021 年,美国对东盟投资流量达 402.5 亿美元,增长 40%,为东盟最大投资来源国,占当年流入东盟投资总额的 22.5%;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为 138.3 亿美元,增长 96%,占当年流入东盟投资总额的 7.7%。^⑤

其三,美国对“印太”直接投资的收益—风险比高于中国。截至 2021 年底,美国在“印太”的投资目的国主要聚焦于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投资则主要分布于东亚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 56 个

① 根据《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10 国具体包括: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参见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2021,” July 2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2 年版,第 55~60 页。

②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2021,” July 2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 <http://images.mofcom.gov.cn/wzs/202211/20221102151438905.pdf>, 2023.3.23。

③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 49~54 页。

④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irect Inves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2021,” July 2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⑤ UNCTAD,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22; Pandemic Recovery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September 1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AIR2022-Web-Online-Final-211022.pdf>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ASEAN launches Investment Report 2022,” September 14, 2022, available at: <https://asean.org/asean-launches-investment-report-2022/>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ASEAN Stats Data Por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atistics (FDIS), available at: <https://data.aseanstats.org/fdi-by-hosts-and-sources>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有 20 个属于“印太”地区,其中只有韩国、新加坡两国为低风险,其余 18 国均属于中、高风险级别。^①从行业来看,目前美国对“印太”的直接投资相对集中于高端制造业、金融保险业和科技服务业等投资回报率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中国则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②

其四,中国与“印太”国家直接投资合作的机制化程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域内 24 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针对其中 17 国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③。同时,中国已与域内 23 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另签有中日韩区域投资协定;^④美国仅与其中 4 国签有双边投资协定。^⑤

(三)科技:中美形成一定竞争态势,在不同国家和领域分化较大

其一,中国科技研发投入总额、强度及 GDP 占比均不敌美国。据统计,2020 年中国研发经费为 2.4 万亿元(约 36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占当年 GDP 比重约为 2.4%;占美国研发投入总额的 54%,是日本的 2.1 倍,位居世界第二。^⑥2016~2020 年,中国投入强度从 2.1 提升至 2.4,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3.39);但中国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1.48%,增速远高于美国(7.3%)。^⑦2021 年中国研发经费为 2.8 万亿元(约 4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增速比上年增加 4.4 个百分点,投入强度提升至 2.44。^⑧

其二,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领先,但对域内尖端科技人才的吸纳程度仍不及美国。截至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居世界第一,已培训超过 1.5 万名“一带一路”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家风险评级项目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2)》,第 60~61 页。

②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2021,” July 21,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7/dici0722.pdf>, 2023.3.23;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1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③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 年 8 月 15 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 2023.3.23。

④ 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 2023.3.23。

⑤ Trade Compliance Center of the U.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Currently In Force,” available at: https://tcc.export.gov/Trade_Agreements/Bilateral_Investment_Treaties/index.asp, 2023.3.23。

⑥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1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2/content_5638653.htm, 2023.3.23。

⑦ 根据 2016~2020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⑧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21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2 年 8 月 31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547.htm, 2023.3.23。

沿线国家科技人员,资助专家近 2000 人次,但“印太”国家来华长期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籍人员极少。^①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现状报告 2022》,2019 年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劳动力总数 3609.4 万人,外籍人员占比达 19%。其中获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外籍劳动力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亚洲,尤其是印度(22%)、中国(11%)、菲律宾(4.2%)、韩国(2.9%)和越南(2.9%)。^②

其三,中国对“印太”地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规模远超美国,但更多国家对美国出口依赖度更高,中美在高新技术产业链不同环节各具比较优势。据统计,2021 年中美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分别达 8375.8 亿美元和 5532.4 亿美元;9794.2 亿美元和 3572.9 亿美元,其中亚洲均为中美最大出口市场。^③ 2021 年,中国与东盟、日、韩半导体产品(代码:8541)和制造设备(代码:8486)的进出口总额分别达 183 亿美元、201.6 亿美元、93.7 亿美元,均高于美国与东盟、日、韩的贸易规模(135.6 亿美元、68.8 亿美元、86.2 亿美元)。^④ 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例,截至 2020 年底,“印太经济框架”10 个地区成员国中(除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外),中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4 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均高于美国;在印尼、印等 6 国 ICT 产品进口额中的份额明显占优,但在出口额中的占比均不及美国。^⑤ 从产业链来看,中国在基础硬件设计及制造、数据库与中间件、基础软件等方面仍有较大劣势,但在手机芯片设计、交换机和路由器等领域已具备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在终端硬件方面,中国在中低端市场具有较大竞争力,营收增速较快,是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与美竞争的中坚力量。在应用软件方面,美国仍占据更大市场份额,但随着抖音、微信等中国手机应用软件在更多周边国家受到追捧,中国对美差距正加速缩小。

其四,中美在“印太”开展科技合作的对象、领域和成效各具比较优势。中国在域内科技合作伙伴主要以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涉及电子、信息、通信、软件、医疗等多个产业;美国的科技合作伙伴主要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为主;聚焦于人工智能、半导体、先进通信技术等高精

① 颜欢等:《以科学繁荣发展造福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22 年 12 月 25 日第 3 版,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1225/c1002-32593082.html,2023.3.23。

② National Science Board, *The State of U.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22*, Jan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21/u-s-and-global-stem-education-and-labor-force>, 2023.3.23.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总署、美国人口普查局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④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https://comtrade.un.org/data/>。

⑤ 信息通信技术(ICT)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与重要引擎,对其他产业和世界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辐射作用,并对国家安全与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因此在科技领域较具代表性。

尖产业。近年来,中国与域内各国科技合作产出规模迅猛增长,产出效率显著提升,与美国各具比较优势。以联合专利申请为例,2018~2020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均为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前三大合作伙伴,三国与中美联合专利申请量分别为1588、1829;1147、353;51、182。中国在产出规模上整体领先,且与新加坡合作更为密切;但核心专利占比、与日韩合作密切程度等方面仍不及美国。^①

(四)金融:中国显著提升,但整体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其一,中国金融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发展程度远不及美国。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更加健全,金融规模持续拓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产品日益多样、金融机构关联性显著上升。然而,与美国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比,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仍存在相对低效和“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在规模、效率、活力、稳定性等各项指标上的表现均不及美国。^②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2》,美国金融体系相对规模、效率、活力和稳定性分别位列全球第10、第3、第4和第19;中国排名则分别为第18、第7、第10和第27。^③

其二,人民币在域内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但影响力仍与美元差距悬殊。近年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政策红利,中国—东盟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深化,人民币在东盟的跨境使用和影响力也随之提升。^④ 截至2021年底,东盟成员国中有6国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4国与中国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3国与中国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议。2021年,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4.8万亿元,比十年前增长近20倍;东盟新增了16家东盟金融机构间接参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处理跨境人民币业务3.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50%。^⑤ 然而,无论是在次区域和区域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人民币影响力都与美元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21年底,人民币在东盟的影响力位列全球第二,远超欧元和日元,但落后于美元。^⑥ 在亚洲新兴和

① 徐奇渊、董维佳、郎平、姚曦:《中美科技博弈变局下的中国视角》,载《开放导报》,2022年第5期,第64~71页。

② 刘磊、邵兴宇、王宇:《金融结构特征与金融体系发展:大国的比较》,载《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第71~101页。

③ 全球金融竞争力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编著:《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2~64页。

④ 高海红:《人民币东盟使用的新动能》,载《区域金融研究》,2022年第1期,第19~23页;王莹丽:《深化与东盟经贸合作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载《中国外汇》,2022年第6期,第46~49页。

⑤ Yang Panpan, Xu Qiyuan, “Strong Support,” *China Daily Global*, May 5th, 2023,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305/05/WS64549deba310b6054fad13dc.html>, 2023.6.8.

⑥ Yang Panpan, Xu Qiyuan and Zixu Zhang, “Re-examining RMB as An Anchor Currency,” Conference Paper at RI-ETI-IWEP-CESSA Workshop 2022.

发展中国家中,2021年人民币区占比已从2010年的1.4%~10.6%大幅提升至17.7%~32.5%,显著高于欧元、日元,但美元区占比仍高达44.4%~58.5%。^①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完成5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将人民币特别提款权(SDR)权重上调至12.28%,但仍远不及美元(43.38%)。^②根据《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2》,目前美元与人民币货币竞争力指数为100/9.53;外汇储备货币占比分值为100/4.75;跨境支付货币占比分值为100/6.67。^③

其三,中国在区域金融治理与改革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在IMF等主要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平台中的话语权仍远不及美国。近年来,中国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丝路基金、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平台,在区域金融治理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印太”30国中,有25国为亚投行成员;中国作为亚投行的最大出资国,目前在该组织中占据最大投票份额(26.58%),影响力远超其他国家。^④截至2022年,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202个,融资总额逾388亿美元,撬动资本近1300亿美元,为促进地区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注入了新动力。^⑤然而,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其他主要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远高于中国(如图4所示),并与澳、加、德、法、英等西方盟友在二十国集团(G20)等主要国际非正式协调平台中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美国还凭借三大专业信用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牢牢掌握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评级话语权。

① Masahiro Kawai and Hiro Ito,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 Trilemma,” Conference Paper at Meiji University and IWEP-CASS 2022 Workshop “Futur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n an Uncertain World”.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完成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中国经济网,2022年5月15日, http://intl.ce.cn/sjjj/qy/202205/15/t20220515_37582272.shtml, 2023.6.8。

③ 全球金融竞争力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编著:《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2》,第41、80~85页。

④ Cameron Hill, “Assess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Development Policy Centre, August 17, 2022, available at: <https://devpolicy.org/assessing-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20220817/>, 2023.6.8; Soo Yeon Kim, Jesslene Lee, “Gaining Ground, Gaining Influence? Vote Shares and Power in the AIIB,”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EIO), Febr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peio.me/wp-content/uploads/2020/02/PEIO13_paper_100_1.pdf, 2023.6.

⑤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七周年项目遍布全球33个国家》,光明网,2023年1月16日, <https://m.gmw.cn/baijia/2023-01/16/1303255615.html>, 202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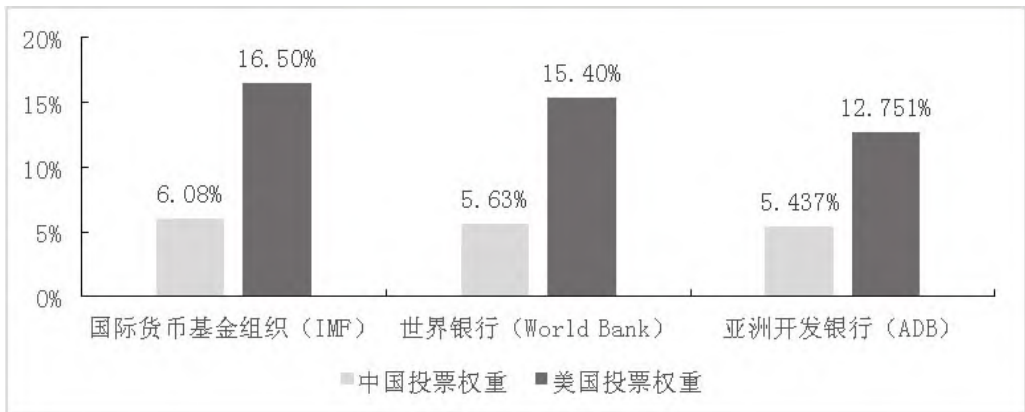


图 4 中美在主要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投票权对比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ubscriptions and Voting Power of Member Countries”, May 2, 202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May 14, 202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nual Report 2020: Members, Capital Stock, and Voting Power,” December 31, 2020.

表 3 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对比现状

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对比现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经贸影响力	
2) 域内各国对中美贸易依赖度		
3) 中美与域内各国贸易的品类结构		
4) 中美与域内经贸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覆盖范围		
投资影响力		1) 域内各国与中美的双向直接投资存量及对中美的投资依赖度
		2) 中美对域内各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及增速
		3) 中美对域内直接投资的收益-风险比
		4) 中美与域内投资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覆盖范围
科技影响力		1) 中美科技研发投入总额、强度及占 GDP 比重
		2) 中美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及吸纳域内科技人才数量
		3) 中美对域内各国科技产品出口总额
		4) 中美与域内科技合作的覆盖范围、产出规模和效率
金融影响力		1) 中美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
		2) 中美在域内的货币影响力
		3) 中美在域内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 注: 中国领先的指标用 □ 表示; 美国领先的指标用 ■ 表示; 双方各具比较优势的指标用 ▨ 表示。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综上所述, 目前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影响力明显占优; 科技影响力与美国

各擅胜场,形成一定竞争态势;投资和金融影响力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在本文构建的 15 个二级指标中,中国在其中 5 个指标的表现明显占优;美国在其中 6 个指标的表现遥遥领先;中美在其中 4 个指标上各具比较优势(如表 3 所示)。因此,尽管目前中国在“印太”地区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相对重要性整体仍不敌美国,尚未真正具备对美“地缘经济优势”。

三 中美“印太”经济影响力发展趋势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维持和扩大经贸影响力优势的难度或将加大,在投资和科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或趋激烈,进一步缩小对美差距的阻力和不确定性或显著增加,但有望进一步收窄在金融影响力方面对美差距。

(一) 经贸:中国有望取得更大发展,但维持对美优势的难度或显著增加

其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全面实施有望激发中国与其他地区成员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整合供应链产业链等方面的合作潜力,但也可能会对中国部分产业造成一定冲击。据统计,自 2022 年 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年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12.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对东盟 10 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6.52 亿元,占中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的 50.35%,增长了 15%。^① 2023 年 2 月,菲律宾国会参议院正式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书,该协定于 6 月 2 日正式对 15 个成员国全部生效。^② 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有望为提升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区域产业链融合升级和经济协同发展带来更多新的机遇。^③ 然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释放更多“开放红利”的同时,也可能使中国与其他成员在部分产业的竞争加剧。例如,中国汽车零件可能会与日、韩等国竞争加剧;石油制品或将面临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竞争;集成电路可能面临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

① 中国东盟农商会:《2022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2023 年 2 月 17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I5ODQzNTU4NQ==&mid=2247500518&idx=2&sn=4eede7794c0c6c9b3ad54f09fd6c5ce6&chksm=eca75788dbd0de9e625a3d4f1023a5b5501f96de6c6795c2e4f159fac072c9a4fece9e119c5c&scene=27, 2023.6.9。

② Cliff Venzon, “Philippines Ratifies RCEP Trade Deal after Shift by Marcos,” *Nikkei Asia*, February 22, 2023, available at: <https://asia.nikkei.com/Economy/Trade/Philippines-ratifies-RCEP-trade-deal-after-shift-by-Marcos>, 2023.6.9.

③ 闫洁、王晓薇:《菲律宾批准 RCEP 协定经济发展迎多重利好》,新华网,2022 年 2 月 23 日, http://m.news.cn/2023-02/23/c_1129390806.htm, 2023.6.9。

亚等多国的冲击。^①

其二,在疫情反复、俄乌冲突延烧扩大、全球经济低迷、中美战略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在“印太”地区维持经贸优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或进一步增加。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已被削弱,但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比较优势的难度显著增加,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正面临较大的竞争优势“断档”风险,以及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受国际市场原料价格上涨、部分中间品供应紧张、物流成本上升、外需不足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中国与域内主要合作伙伴之间贸易规模的增长空间恐更加有限,增速或趋下降,短期内甚至可能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例如,2023财年中印贸易总额同比下降1.5%至1138.3亿美元;美印贸易总额同比增长7.65%至1285.5亿美元。^②2023年1~2月,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1381.21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与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进出口额同比下降5.3%~7.5%;对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进口额同比下降21.5%~24.1%。中国与日、韩双边贸易额为499.95亿美元和483.39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12.8%和16.3%。^③

其三,随着“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的加速推进,中国与其部分成员之间经贸合作的密切程度与机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考虑到美国以更多政治或经济承诺来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的筹码实际较为有限,拜登政府或将通过加大对其他地区成员的外交攻势,大肆炒作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胁迫论”等方式来推动谈判进程,加强与它们之间的政策协调。^④受其影响,其他地区成员可能会强化对华威胁认知,并出于安全考虑迎合美国重塑区域供应链的诉求,降低部分领域的对华贸易依赖度。“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期间,美国多次以经济安全为由向澳、日、韩等成员施压,要求它们加入美在半导体、电池、关键材料和制药等领域的供应链重组工作,并与其他成员率先在韧性经济支柱接近达成共识就是一个很好

① 孙军:《RCEP中的中国角色与新发展格局构建》,载《学术论坛》,2023年第2期,第83~94页;“US Emerges as Ind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2nd year Straight,” *Fortune India*, April 17,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tuneindia.com/macro/us-emerges-as-indias-biggest-trading-partner-for-2nd-year-straight/112291>, 2023.6.9.

② “US Emerges as Ind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2nd Year Straight,” *Fortune India*, April 17,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tuneindia.com/macro/us-emerges-as-indias-biggest-trading-partner-for-2nd-year-straight/112291>, 2023.6.9.

③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https://comtrade.un.org/data/>。

④ 蒋芳菲:《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载《美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33~49页。

的例证。^① 不仅如此,部分成员也可能会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印太经济框架”之间变得更加“三心二意”,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进程的动力变得更加不足,甚至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态度也更为消极。^②

(二) 投资:中国有望继续收窄对美差距,但在部分国家和领域或面临更大挑战

其一,新冠疫情的蔓延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与域内各国开展投资合作的不确定性,不仅对各国既有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造成了较大阻力,也降低了各国企业对外开展新投资项目的动力。然而,随着全球疫情形势逐步好转,中国仍有望进一步加大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来华投资的增长空间。一方面,在“后疫情时代”,“印太”地区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域内多国可能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中国也会采取更多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从而能够对中国稳步提升对域内直接投资流量、增速和收益—风险比起到一定的双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和国内经济的逐渐复苏也有利于稳定和提振外资来华投资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中国对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域内主要投资来源国的吸引力。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分别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5.3% 和 5.2%,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保持乐观。^③ 2023 年 1 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5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其中“印太”地区仍然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2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5%。^④ 根据贸促会调查报告,71.8% 中企表示对外投资将优先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8.7% 的企业对外投资优先选择制造业,且超一半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增加或保持稳定。^⑤

其二,近期中国在周边外交上取得的一系列新突破与新进展有望为中国与部分域内国家增强双边投资合作增添新动力。例如,2023 年 5 月,中国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与中亚五国签署了百余份合作协议,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与中亚

① Eric Martin, Peter Martin and Sam Kim, “US-Led Pacific Trade Talks Close to Reaching Supply Chains Pact,” *Bloomberg*, May 19,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5-19/us-led-pacific-trade-talks-close-to-reaching-supply-chains-pact#xj4y7vzkg>, 2023.6.9.

② 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29~46 页。

③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Mid-year Update*, May 16,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publication/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as-of-mid-2023/>, 2023.6.9;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for Asia and Pacific: Recovery Unabated amid Uncertainty,” May 3,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APAC/Issues/2023/04/11/regional-economic-outlook-for-asia-and-pacific-april-2023>, 2023.6.9.

④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2023 年 1 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23 年 2 月 23 日, available at: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302/20230203393326.shtml>, 2023.6.9.

⑤ 《〈2022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发布》,光明网,2023 年 2 月 22 日, <https://m.gmw.cn/baijia/2023-02/22/1303291429.html>, 2023.6.9.

各国深化和拓展投资合作、提升合作机制化程度创造了更多机遇。^①又如,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特地修改了涉华直接投资政策,导致双边投资流量急剧下滑。2021年,中国对印直接投资流量为2.79亿美元,较2019年(5.35亿美元)下降47.9%;2021年印度对华投资仅632万美元,同比下降47.4%。^②自2022年以来,从王毅访印到中印宣布从加南达坂地区一线撤军,再到中印举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机制第26次会议,并在金砖、上合、G20等多边平台开展务实合作,中印关系趋于缓和。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政府批准的涉华投资项目开始增加,中国对印投资的政治阻力也有所减小。

其三,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尤其将增强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印太”重点盟伴与支轴国家在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双向投资合作,因此美国在这些国家和领域的投资增速和收益—风险比可能会远超中国。例如,2009年至2020年,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了182.8%,其中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增幅高达327%。^③2021年以来,美国联合韩国、中国台湾等“印太”盟友不断加大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已宣布的对日投资总额逾2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16.5亿元)。^④根据拜登政府最新公布的预算案,美国2024财年还将进一步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资,额度比2023财年增长18%,其中包括对“印太”关键领域基础设施投资20亿美元等。^⑤2023年3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率领10家美国公司高管访印,表示美国企业将在印度进行多项“重大投资”,希望印度能够成为美国电子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⑥5月,美日印澳宣布成立旨在促进各方在清洁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技术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四方投资者网络”(QUIN)。

(三)科技:中美竞争更趋激烈,中国赶超美国难度或将加大

① 《中国同中亚五国签署了百余份合作协议,成果之丰前所未有的》,《新京报》,2023年5月19日,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8450453414273.html>, 2023.6.9。

② Naina Bhardwaj, “India-China in 2023: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spects,” *India Briefing*, January 13,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india-briefing.com/news/india-china-bilateral-trade-and-investment-prospects-26894.html/>, 2023.6.9。

③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apan's US Investment Dynamic 2022: Reflecting o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by Japanese Compan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usa/2022/Japan-US_Investment_Report/Japans_US_Investment_Dynamics2022.pdf, 2023.6.9。

④ 《半导体企业扩大对日投资,超2万亿日元》,日经中文网,2023年5月19日, <https://36kr.com/p/2264212825219081>, 2023.6.9。

⑤ The White House,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24,” March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3/03/budget_fy2024.pdf, 2023.6.9。

⑥ Shivangi Acharya, “U.S. Seeks Closer India Tech Ties; No China ‘Decoupling’ - U.S. Commerce Secretary,” Reuters, March 10, 2023,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us-seeks-closer-india-tech-ties-no-china-decoupling-us-commerce-secretary-2023-03-10/>, 2023.6.9。

其一,考虑到美国将加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以及中国经济增速或趋于放缓,进一步提高研发强度的难度加大,短期内中国在研发投入总额和强度等方面恐难以赶超美国,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美差距。根据拜登政府 2024 财年预算案,美国将投入创纪录的 250 亿美元用于《芯片和科学法案》授权的活动,比 2023 年增加约 65 亿美元,其中包括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拨款 113 亿美元;为能源部科学办公室拨款 88 亿美元;为商务部经济发展署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分别拨款 40 亿美元和 10 亿美元。^① 这些投入主要用于加速美国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微电子、量子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增强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力。

其二,中国对域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望继续维持对美优势,但在周边获得更多市场的难度或趋加大。一方面,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在智能手机、通信设备等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且相关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从而为中国在域内维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优势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正联合其欧亚盟伴进一步强化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这也可能使中国对域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受到更大冲击。据统计,2022 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 9513.30 亿美元,占出口总值近三成,但比 2021 年同比下降 2.8%,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额为 30012.2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7%。^②

其三,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围绕高新技术人才、国际规则、供应链、产业链等方面的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2023 年以来,从美印正式启动“关键和新兴科技倡议”(iCET),到美日印澳举行网络安全会议并宣布成立“四方投资者网络”,再到美日荷加紧实施对华芯片设备出口禁令,“四方芯片联盟”正式启动,美国正在“印太”地区加速构建“遏华科技联盟”,加紧切断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获取外部创新资源的渠道,不断诱迫日、韩、印、澳等地区盟友对中国科技“脱钩”。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部分美国盟伴之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可能会严重受阻,产出规模和效率可能急剧下降,从而导致其在关键前沿科技领域赶超美国的难度大大增加。不仅如此,随着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博弈进一步加剧,域内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或趋增大,周边甚至可能形成由中美各自主导的平行科技创新体系。

① The White House,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24,” p.23.

②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22 年 1~12 月出口高新技术产品主要贸易方式情况》,2023 年 2 月 28 日, https://www.ndrc.gov.cn/fggz/jjmy/dwjmjzfcx/202302/t20230228_1350349.html, 2023.6.9;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2022 年中国进出口形势回顾与 2023 年展望》,经济观察网,2023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eeo.com.cn/2023/0115/575061.shtml>, 2023.6.10。

(四)金融:中国有望继续收窄对美差距,东盟或成为重要突破口

其一,中国有望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金融体系稳定性等方面的差距。一方面,党的二十大以来,从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到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再到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出现了一系列优化调整,惩治金融腐败犯罪力度显著加大。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稳步提升其稳定性。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其金融体系的效率、活力和稳定性等都可能受到更大冲击。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接连关闭,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严重的银行危机,美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增加,金融市场震荡加剧。5月,美国两党在提高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上缠斗数月后,美债违约危机再次引发市场担忧。尽管目前风波暂息6月已提高上限,未来仍可能对美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造成更大冲击。

其二,俄乌冲突延烧扩大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可能进一步加速国际货币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各种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禁止部分俄罗斯银行接入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等,既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经济和汇率稳定,也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霸权地位带来了一定冲击。未来一段时期,美西方制俄援乌力度的不断加大将继续鼓励其他国家形成非美元货币结算的贸易体系,进一步增加其他国家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的动机,从而可能进一步削弱美元霸权地位,并提升人民币结算在国际贸易中的现实需求。随着中国—东盟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扩展,双方在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完善区域投融资体系、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有望进一步增强,东盟或可成为中国在“印太”地区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重要突破口。

其三,在疫情反复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冲击下,域内或有更多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加剧。鉴于目前中国已成为域内9国的最大债权国,若能够充分利用金砖、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平台,在帮助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有效应对债务危机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区域金融治理与改革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此外,印度与印尼分别为2023年二十国集团和东盟轮值主席国,上合、金砖扩员也顺应了“全球南方”崛起的历史潮流,中国或可与更多域内外大国和中等强国进一步加强在区域金融治理中的合作,共同推进区域金融治理和改革。

综上所述,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印太”区域经济格局已进入加速调整期。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有望在金融影响力方面进一步收窄对美差距,但在维持

和扩大经贸影响力优势、缩小投资和科技影响力差距等方面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和不确定性。在本文构建的 15 项观测指标中,有 3 项指标可能朝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有 4 项指标可能朝着于中国不利或于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有 8 项指标可能在域内不同国家间分化加剧或发展方向暂不明确(如表 4 所示)。因此,短期内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印太”地区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恐难以赶超美国,甚至可能在部分维度进一步加大对美差距。

表 4 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对比发展趋势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对比现状	经贸影响力
2) 域内各国对中美贸易依赖度		
3) 中美与域内各国贸易的品类结构		
4) 中美与域内经贸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覆盖范围		
投资影响力		1) 域内各国与中美的双向直接投资存量及对中美的投资依赖度
		2) 中美对域内各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及增速
		3) 中美对域内直接投资的收益-风险比
		4) 中美与域内投资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及覆盖范围
科技影响力		1) 中美科技研发投入总额、强度及占 GDP 比重
		2) 中美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及吸纳域内科技人才数量
		3) 中美对域内各国科技产品出口总额
		4) 中美与域内科技合作的覆盖范围、产出规模和效率
金融影响力		1) 中美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
		2) 中美在域内的货币影响力
		3) 中美在域内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 注:可能朝着于我国有利方向发展的指标用 表示;可能朝着于我国不利/美国有利方向发展的指标用 表示;在域内不同国家可能会分化加剧或发展方向暂不明确的指标用 表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但从长期来看,两国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发展趋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笔者认为,未来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对比有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不同场景。一是最乐观场景,即中国不断扩大经贸影响力优势;在投资和科技影响力上加速赶超美国,在更多维度和领域获得比较优势;大幅缩小与美国在金融影响力上的差距,在部分维度获得一定比较优势。二是次乐观场景,即中国继续维持经贸影响力优势;在投

资和科技影响力上难以赶超美国,但仍在部分领域具有一定比较优势;逐步收窄与美国在金融影响力上的差距。三是次悲观场景,即中国逐渐失去经贸影响力优势,与美国在不同维度各擅胜场;在投资和科技影响力上与美国差距拉大,丧失在部分领域的比较优势;缓慢缩小与美国在金融影响力上的差距。四是最悲观场景,即中国彻底失去经贸影响力优势;与美国在投资、科技影响力上的差距不断加大;在金融影响力上缩小对美差距能力更为有限。

四 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二元格局论”的反思,本文尝试从经贸、投资、科技、金融四个维度初步构建了评估国家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多维分析框架与多级指标体系,并在“印太”视域下对中美两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对比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

本文的研究表明,一国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是“多维共振”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在经贸、投资、科技、金融四个维度的区域影响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也意味着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相较于美国,目前中国虽在区域经贸影响力上整体领先,但在投资、科技领域的影响力整体仍不及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更是与美国差距悬殊。这也意味着中美在“印太”地区都不完全具备“地缘经济优势”,两国共同享有一定的“地缘经济优势”或许更符合地区现状。随着美国对华竞争从“亚太”转向“印太”,地区“二元权力格局”可能不是反映在经济与安全领域,而是更多反映在经济领域内部。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对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印太”地区经济格局已进入加速调整期。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有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影响力的较大潜力,但也可能会在经贸、投资和科技等领域面临更大挑战和阻力。短期内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恐难以赶超美国,甚至可能在部分维度进一步拉大对美差距。但从长期来看,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对比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四种不同场景。

通过对比中美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和启示是,国家在不同领域/维度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但不同领域/维度的影响力在转化为该国区域经济影响力、影响域内其他国家政策行为时的效率和重要程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且单一领域/维度的影响力优势对该国区域经济影响力的整体提升、对域内其他国家政策行为的影响都相对有限。因此,不同领域/维度影响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一国区域经济影响力变化的重要程度仍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探讨。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客观地认识经贸影响力优势对于中国提升区域经济影响力、

影响域内各国政策行为的有限性,也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与域内各国建立影响力转化率更高的经济联系形式、在对各国经济发展增幅器效应更强的领域开展合作。

通过比较中美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发展趋势,还能够得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和启示是,随着“印太”地区成为中美经济竞争和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作为“第三方”的域内其他国家可能会在对华和对美关系、自身战略空间以及不同议题领域的政策选择等方面分化加剧。在美国的诱迫下,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对华开展经济合作的空间可能会缩小,但域内更多国家可能仍更倾向于在不同议题领域与中美两国开展务实合作,在中美竞争中更加“左右逢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域内其他国家有望成为缓冲中美竞争的关键“中间地带”,其利益偏好和政策行为反过来也可能对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和中美区域经济影响力对比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更好地经营与域内“第三方”的关系,切实推进与更多国家在不同议题领域的务实合作,做大做强“中间地带”,也可能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蒋芳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仇朝兵)

ternalized stereotypes,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nd divergent values. In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ethnic minority electorates and the multifaceted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both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Republic Party are recalibrating their strategies to garner more support. Through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that synthesize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seeks to illuminate the nuanced evolution of American ra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amid demographic transformation.

America’s Foreign Strategy and the Sino-U.S. Relations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U.S.-ROK Alliance

Li Nan (60)

As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nsifies,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ntinues to escalate, and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ided. In this situation, the Taiwan question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pgrading and reshaping of the U.S.-ROK alliance, and Taiwan-ROK relations will also be readjust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engthening of external threats will become the glue for alliance consolidation, and the Taiwan question will undoubtedly strengthen the consensu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OK to jointly respond to the “China challenge.” As for ROK, however, facing the direct threat from DPRK, it cannot fully assist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aiwan region militarily and economically. It is even more worried about be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aiwan question, from ROK’s perspective, has instead become a new point of division in the U.S.-ROK alliance.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between large countries and small countries in the alliance system will become a new form in the drastic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Reexamining the “China-U.S. Dual Leadership The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Structure

Jiang Fangfei (79)

Based on the puzzles related to the “China-U.S. Dual Leadership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evaluates their regional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structure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rade, 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fi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eir ow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regional dual-power structure may not exist in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fields, but only in the economic field. So far,

except for lagging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ertain dimensions, China overall has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rade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fields of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China has remarkably narrowed the gap with the U.S., and enjoyed certai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several dimensions. However, despite that China has steadily increased its regional financial influence, the gap with the U.S. is still huge. In the near future, China is expected to further narrow the ga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regional financial influence. However, it might become mor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maintain and enhance its influence advantage in trade, and its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may become even more intense,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catch up with the U.S. in these field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Path, Impacts and Constraints**

Gong Xiaofei (105)

After Joe Biden came to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ies, increasing its interven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y subsidiz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expanding labor supply, implementing repressive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forming industrial alliance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follows specific security, political and hegemonic logic, aiming to enhance the security of the U.S.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serve its “middle-class first” policy, and assist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Given the strong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engthening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olicies will push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from globalization to localization and hinder the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sive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ies not only impact the security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but also “push back” the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 state intervention market model behi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emiconductor industrial policy is not only constrained by local labor shortages, but also has difficulty gaining support from allies because of its strong “America First” overtones, and cannot satisfy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pursuit of maximizing benefits. The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remains to be seen.